

**彻底清算陶鑄、赵紫阳**  
**在广东农村**  
**复辟資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第一集)**

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  
机关紅司

广东省农业厅《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于广州

## 前 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南和广东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鑄、赵紫阳及其死党，多年来在广东拼命破坏社会主义农业，在农业工作上执行修正主义路綫，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干尽坏事，罪恶滔天。我《总司令部》全体战士对陶、赵这一伙坏旦无比痛恨，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揭发了他們大量材料。现将其中的一部份分批編印出来。誓把陶、赵及其死党通通揪出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 陶鑄、趙紫陽十多年來在 廣東農村干了些什麼？

（揭穿陶鑄、趙紫陽破壞社會主義農業，  
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

解放十七年來，廣東的農業生產和全國一樣，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的照耀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貧下中農，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導，發揚不斷革命的精神，以階級鬥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大踏步前進，社會主義生產的積極性日益提高。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陶鑄、趙紫陽及其同黨——廣東大大小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却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十多年來，他們一再竭力抹殺和取消階級鬥爭，想方設法打擊廣大農民的社會主義生產積極性，不擇手段地多方進行破壞，削弱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阻礙和破壞農業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着奪取政權，鞏固政權。”陶鑄、趙紫陽一再竭力抹殺和取消階級鬥爭，千方百計破壞廣東社會主義農業，其要害就是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陶鑄、趙紫陽及其同黨為了實現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採取了十分陰險狡滑的手法。從十多年來的一系列罪惡活動中，充分暴露了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一貫的，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而且是打着“紅旗”反紅

旗的，历史完全证明了陶鑄就是一个赫魯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下面我们吧陶鑄、赵紫阳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两面三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南和广东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多年来处心积虑，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以实现其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目的，而在农村，在农业生产上所犯下的一系列滔天罪行公诸于世，请大家看一看，长期来他们是如何弄玩两面派手法，如何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的。

## 积极提倡私有观念， 竭力贩卖资本主义黑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就是封建的统治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广大穷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积极要求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陶鑄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违背广大农民的意愿，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一九五二年底到一九五三年初，他提出了土地改革后“生产压倒一切”的口号，鼓吹“要全力转入生产”一字不提阶级斗争。一九五三年，在华南分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还以发展生产为名，竭力鼓吹“稳定新的生产关系，保护私有制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胡说什么“私有观念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大肆提倡“四大自由”，即：“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出租自由、买卖自由。”并无耻地号召党、团员、干部要放债雇工，他在青年团华南工委扩大会议上说：“团员要积极宣传

保护农民私有制，确立新的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又说：“凡是土改后妨碍农民私有制的确立和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的行为，都要制止和批判。”他甚至还胡说：“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可以发家致富。”明目张胆的鼓励团员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看：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早在十多年前，在土地改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就阴谋乘机把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稳定下来。很明显，他的所谓稳定生产关系，就是要限制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提倡四大自由，就是要在堵塞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后，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加速农村的两极分化。名义上是为了发展生产，实际上是干着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这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又是什么呢？这不是两面三刀的反革命手法又是什么呢？陶铸这个南垠天，为了实现他的这一反革命罪恶目的，不仅当时在舆论上已作了准备，而且还利用自己的职权，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布告，把他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四大自由”等黑货合法化，在全省明令推行。当时身任华南分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的赵紫阳及广东地区大大小小的陶家死党对此奉若神明，竭力推行。赵紫阳还亲自出马到惠阳等地去推销，使土改后农村刚刚掀起的互助合作运动一时受到了巨大阻力，一部分地区土改刚一结束，重又出现了雇工，出租土地、放高利贷的现象，甚至一些劳力少，生活困难的贫雇农还由于一家一户无法抵抗灾害而出卖土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陶、赵以发展生产为名，抵制和破坏

农业走社会主义道路、拼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指示英明伟大。

陶鑄这个赫魯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不仅在土改一结束就大力鼓吹、推行“稳定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和提倡“四大自由”，而且，还极力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他十分清楚，粮食统购统销是堵塞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项重要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是对陶家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一个重大打击。因此，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便写信给中央，要求全国不要搞粮食统购统销，如果要搞，广东、广西推迟一年实行。他胡说什么：“不实行统购统销，广东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市场保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他的这个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主张，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才没有得逞！

## 大搞反“冒进”，百般限制和打击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陶鑄、赵紫阳虽然竭力贩卖资本主义货色。但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九五四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决议以后，农村的互助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仅仅三年左右的时间，全省就由互助组、初级社发展到大办高级社。这可吓破了陶霸天及其死党的胆了，他们眼看“保护私有制”的美梦已经破产，复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回合已经失败，于是又要出了一个新的花招，对合作化运动大泼冷水，并且公开限制合作化的发展。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在省农业生产动员大会上说：“各地建社工作应一律停止进行，正在进行“三评”的要很好结束“三评”，未进行“三评”的留待作为下批

建社对象，应集中力量把建起来的社巩固好，迅速转入生产，一定把生产搞好”。他还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意旨，以“反冒进”为名，大煽反合作化的阴风，对已办起来的合作社，肆意夸大缺点，諸多挑剔，百般打击农民办社的积极性。甚至在一些地方不择手段把建社数目砍下来，誘騙报名入社的貧下中农退社。企图以此来稳住自己的陣脚，以便繼續干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

正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陶鑄天，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大肆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候，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們最最敬爱的伟大領袖毛主席在全国省、市、区党委書記會議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尖銳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从此，农业合作化运动重又出現了蓬蓬勃勃的新高潮。但是，陶鑄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人还在，心不死，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仍然負隅頑抗，拼命和毛主席唱反調，一再強調要防“左”，規定比例，限制发展。他要各級党委在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总戶数的百分之四十时就刹車，在省、地、县委書記四級干部會議上他胡說：“（組織面）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应当說是到了限度了，再多了就会超过限度成为‘左’傾了”。为了达到破坏合作社的目的，一九五七年陶鑄在一次省委会議上又公然鼓吹什么“……光是靠斗资本主义思想是解决不了問題的。要巩固合作社，使社員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基本的还在于搞好生产，增加收入”。又說：“要巩固合作社，首先要从經濟上巩固”。企图用經濟主义来把合作社引入歧途。更恶毒的是，他竟避开政治思想工作，抹杀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宣扬什么：“富裕中农鬧退社，根本原因是合作化后降低了收入水平”。由于陶鑄及其死党进

行了一系列破坏合作社的阴谋活动；由于陶鑄存心在农村搞资本主义复辟，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极力推销经济主义黑货，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不少地区牛鬼神蛇纷纷出笼，退社、闹单干和投机倒把的歪风盛行一时，仅仅一九五六年，全省就有十三万农户闹退社。珠江三角洲不少农民受了陶、赵及其死党的蒙蔽，甚至到省人委请愿，要求退社，一个时期，省人委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大批要求退社的农民。不少地区，在生产上也不按国家计划安排，只要多钱捞的作物，就拼命种。在这种情况下，陶鑄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在一九五七年五月还得意洋洋地继续大肆鼓吹退社，胡说什么：“去年广东省有十三万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我们完全让他们退，他们完全有自由，也是合法的……”。陶鑄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货，不是十分明显的了吗？！

## 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恶毒攻击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经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和党内反地方主义斗争以后，城乡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广东和全国一样，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工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飞跃发展的局面。粮食获得了特大丰收，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经过三年苦战，农业基本建设更是成绩辉煌。

陶鑄、赵紫阳及其死党，出自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仇恨，对三面红旗拼命进行反抗。他们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初则以反冒进为名，限制和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



性；继則对农业生产卖命地进行破坏！最后，当国民經济出現暂时困难的时期，便大肆污蔑和攻击三面紅旗，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为复辟資本主义、实现篡党、篡軍、篡政的阴谋，再一次大做輿論。

一九五八年四月，陶鑄发表了《从反“冒进”的錯誤中应吸取的教訓》一文，胡說什么：“在目前来讲，我看还是‘左’的教条主义的障碍是主要的”。“要突出地強調反对‘左’的情緒”。毛主席教导我們說：“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們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領導，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陶鑄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大跃进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提出要反“冒进”，反“左”的教条主义，其用心不是十分明显的嗎？

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間，陶、赵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看到反“冒进”，反所謂“左”的教条主义不能收到多大效果，于是又要了一套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法，以搞高产为名，对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实行威逼利誘，要全省夺取所謂“高产荣誉”，实际上大搞高指标，瞎指揮、强迫命令，蓄意破坏生产。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間，陶、赵糾集了大批人馬，組成生产检查团，分赴各专区检查生产，陶鑄亲自率領数十人，其中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匡，吳南生等，到惠阳和汕头专区，所到之处都提出要“拔白旗”，对基层干部和群众大施压力。不少地方，不問具体条件，凡是产量比較低的都称为“烏龟社”、“下游社”。八月，广东省委召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紧急會議，陶鑄在会上胡說什么：“全省再也沒有比夺取荣誉更重要的事了”。他提出夺取荣誉的办法是两条：一是“拔白旗”，改組各級司令部，

就是說如果不跟他們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搞瞎指揮，强迫命令，就要撤职；二是大搞物质刺激，規定晚造以县为单位亩产达到一千斤以上的，除奖給“指揮检查生产用的”小吉普車一辆以外，分別奖給拖拉机站一个，載重汽車十輛，年产二千吨的化肥厂設備一套。这股修正主义的阴风，給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少地方为了夺取“高产荣誉”，为了爭得奖品，晚造大搞高度密植，大搞并田。有的县甚至拼命虚报产量，严重的助长了“浮夸风”。

广东一九五八年晚造生产尽管受到了陶、赵及其死党的一再破坏，損失不小，但是，仍然获得了特大丰收，陶鑄見計不成，在秋收之后，便在一次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号召全省人民放开肚皮吃三頓干飯；赵紫阳接着也举起双手說：“我完全拥护陶書記的号召”，要全省认真貫徹，还規定吃飯不用钱。这样做的結果，粮食大量浪费，不少地区經過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出現了口粮紧张的情况。

他們並沒有从此罢休。一九五九年仍然繼續大搞瞎指揮，浮夸风，强迫命令风。一九五九年三月赵紫阳在《上游》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一千亿斤粮食而战”的文章。要全省在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就达到一千亿斤，最少也要保証八百亿斤。誰都知道，我省的粮食年产一般只有×百亿斤左右，要搞到年产一千亿斤，就得增产好几倍，按赵紫阳在文章中所列举的数字，条件比較好的基本农田，一造要产稻谷×千×百斤，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陶、赵不择手段，向基层干部拚命施加压力，鼓吹大搞高度密植，越密越好，凡是敢于科学地坚持合理密植的人，都被指責为“思想右傾保守”，“跟不上形势”。在鼓吹高度密植，越密越好的同时，他們还不顧当时的具体条件，要全省各地大搞深翻，全面

开花，越深越好，最少要搞到一尺半深。本来深翻改土是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由于在越深越好的思想指导下，不少地区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代价，都收不到应有的效果，不少稻田翻得太深（象四会就有的挖至五尺至一丈多深），打乱了土层，禾苗长得参差不齐，不但不能增产，反而减少了产量，同时，还由于劳动力过于集中搞深翻，冬季生产和春耕备耕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更严重的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全国各省、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以后，陶、赵仍然一意孤行，对毛主席的指示不闻不问，不组织学习，不贯彻执行，甚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毛主席的这封信扣压起来，直到第二年开展农村整风整社时才发下去。因此，由陶、赵一伙党内“走资派”刮起的一股股破坏生产的黑风，得不到及时和彻底的纠正。

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赵及其共同党对农业生产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加上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广东的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基本建设在三年大跃进中，虽然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是一九六一年和六二年也出现了国民经济生活暂时困难的现象，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陶、赵及其共同党在这个时候，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三面红旗，对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

陶铸胡说什么：“我们前三年搞了个贫困的痛苦的社会主义”，又说：“我们现在不仅没有原子弹，而且鸭蛋、鸡蛋也不多”。“错误在那里，我看是执行总路线的错误，这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执行有毛病，另一个总路线缺少一套具体办法”。“总路线本身有些不完备，加上执行中的主观主义、片面性、

包括沒有經驗在內”。同时还污蔑大跃进“搞得太快了”，“搞过头了”，胡說我們党在大跃进中”“碰得焦头烂額”，“长征苦，长征还没有大跃进苦”。还胡說：“农业社可以搞公社，但前进太快了”。“人民公社搞起来是必要的，但所有制改变太快就犯了錯誤”。他紧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肆叫嚷：“少奇同志說，搞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錯誤”。赵紫阳在攻击三面紅旗方面也不比陶鑄落后，一九六二年在省委召开的三級干部會議上，他号召干部“要把思想搞透，把困难摆够”，实际上是动员干部对三面紅旗“訴苦”和攻击，会上，他还胡說：“三年大跃进是大破坏，七年恢复不了”。他甚至把攻击三面紅旗說成是“正視困难的勇敢行为”。在陶、赵的带头和鼓励下，陶、赵死党——安插在各部門各地区的党内大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紛紛出籠，同声攻击三面紅旗。例如陶、赵的亲信三反分子杜瑞芝（佛山地委书记）就更露骨地攻击說：“三面紅旗那面是紅的？都是黑的！共产党要說老实话，黑的就是黑的，那能把黑的說成紅的”！看！这班坏蛋，多么狼心狗肺！三年大跃进，明明是取得了伟大成績，人民公社在日益巩固和发展，一九六一年和六二年所出現的經濟生活暂时困难的现象，也明明是他們这班坏家伙搞出来的，但是，他們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錯誤，却反而恶毒攻击三面紅旗，在他們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不是十分明显的了嗎？！

在这里，我們要严正警告陶、赵及其死党：你們企图用反口咬人的办法，通过破坏生产来攻击三面紅旗，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是白日做梦，一万个办不到！！

## 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和歪曲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鼓吹苏修式的“社会主义”

林彪同志說：“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嶄新的阶段。”又說：“我們要了解什么是現代修正主义，就必须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頂峰。”

陶鑄、赵紫阳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十分明白，要在农村复辟資本主义，为其篡党、篡軍、篡政打下牢靠基础，就必须攻击和歪曲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苏修式的“社会主义”。因此，他們拼命歪曲和污蔑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贩卖赫魯晓夫的現代修正主义货色，公开宣扬苏修式的“社会主义”，为其大規模执行复辟資本主义的措施鳴鑼开道。更恶毒的是，他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諱，攻击和污蔑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毛主席！

一九六二年，陶鑄到汕头、澄海一带，所到之处，都胡說什么“增产就是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减产就是主观主义。”还胡說什么“我們不搞貧苦的社会主义，我們要搞富裕的快乐的社会主义”，陶鑄究竟要搞怎么样的“富裕的、快乐的社会主义”呢？在汕头地委座談会上他道出了真心話，他說：“推行产量責任制，搞好經營管理，这样才叫社会主义，”又說：“生产队除主粮外，产品都可上农貿市场自由买卖，多賺点钱，口粮定、钱多、生活好，生产队就有威信。”很明显，陶鑄所要的所謂“富裕的、快乐的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私人經濟，走单干的道路，

就是多賺錢，过好日子，这和赫魯晓夫所鼓吹的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的謬論有何分別呢？一点也沒有分別！

为了販賣苏修式的“社会主义”，陶鑄甚至还对人民公社进行肆意歪曲，企图把我国伟大的人民公社和苏修的集体农庄相提并論，并且明目张胆地胡說什么人民公社也可以叫“私社”，他說：“所有干部都不例外，一律参加公社，你不当共产党员則已，你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則已，在社会主义陣营还要加入公社的，苏联現在不承认公社，实际在搞公社，小农庄合并大农庄，也是公社嘛！”又說：“我們的公社不等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軍事性质的，我們公社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結合，农林牧付魚全面发展的公社，你不叫公社叫私社也可以，主要是內容問題。”看！陶鑄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以赫魯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修领导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已經完全暴露在全世界的时候，还肆无忌惮地叫嚷苏修的集体农庄也是“公社”，胡說“我們的公社不等于巴黎公社”“叫私社也可以”，这不是公开宣扬，要我們把人民公社，把我們的社会制度引导到修正主义的軌道上去嗎？这不是在群众中制造輿論，为实行資本主义复辟鳴鑼开道是什么呢？！

陶、赵这一伙坏旦，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和污蔑我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是一貫的。但是，在一九五九年，特别是在国民經济出現暂时困难的时期以后，更是显得集中、公开和猖狂。完全和以赫魯晓夫、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現代修正主义集团一脉相承，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密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他們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疯狂攻击三面紅旗，大抓資本主义复辟措施的时候，恶毒攻击我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更充分地暴露了他們篡党、篡軍、篡政的阴謀、野心。

一九五九年，在陶鑄的臭名远扬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胡说什么“他们（指广大人民群众）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事业，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还有黑点。”这是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极端恶毒的攻击。林彪同志教导我们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陶铸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并不是一贯正确，这和林付主席的论断是完全对抗的。在这以后，陶铸更是露骨地攻击并反对我们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他胡说什么：“要跟共产党走，不要跟那个人。”“不要把中央和毛主席倒提，应是中央才主席，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要正确。”又说：“要知道永远保持先进是不可能的，冠军只有一个，而且当冠军的人也不能永远当冠军。”陶铸的死党、三反分子、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也疯狂地公开说：“人人都有错，他（指毛主席）就没有错误？！”在恶毒攻击毛主席后，他还作了自我表白说：“陶、赵最了解我，我不怕打为右派”。这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陶、赵及其死党的反革命庐山真面目了吗？

陶、赵这些反革命两面派，极端害怕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害怕真理，害怕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他们极力阻挠和反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伟大。陶铸胡说什么“和尚也天天念经，你们共产党员不也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又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从马列主义来的”“什么叫做体现毛泽东思想？只要是工农兵喜欢看，看后认识有所提高，就是体现了”，他还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著）都是一般化，怕困难就学习《愚公移山》，一学就通了”。赵紫阳和陶铸是一丘之貉，他胡说什么：“明天做工，今晚学《愚公移山》，

这是实用主义。”“不要停留一件事学一条语录”又说什么：“学习毛著要防止形式主义、防止命令主义，不能强制、奉命学习。”林彪同志教导我们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陶、赵的谬论不是完全和林彪同志的指示相对抗的吗？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赵紫阳反对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他们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 积极推行“三自一包”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陶铸、赵紫阳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国家出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在死命地做了一系列舆论准备的基础上，推出了一整套复辟的主张，其中推行“三自一包”就是他们占领农村阵地，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陶、赵就以黑省委的名义连续召开各种会议，责令各地迅速开放并扩大农村自由市场。他们攻击国营商业“血管硬化”，“整个市场死而不活”；他们胡说什么“我们不怕自发势力，现在不是自发势力太多，而是统得太死。”即使有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活动，最多也是出几个“小贩资本家”，这有什么可怕？”

一九六二年陶铸到汕头、澄海一带还拼命鼓吹要扩大农贸市场的范围，要生产队除主粮外，产品都上农贸市场，并且到处攻击国家计划经济，胡说什么：“象我们现在这样的计划，在



某些地方还不如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还有价值法则来调节，而我们什么都包在计划里面，结果包而不管，没有就没有了。”他们不仅肆意攻击国营商业和国家计划经济，鼓吹扩大农贸市场范围，而且还要党团员、干部带头拿产品到农贸市场上去出售，以“带动群众”。在陶、赵的狂热鼓吹和推动下，城、乡投机倒把分子一时大肆活动，国家统购，派购物资大量流出自由市场，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

陶铸、赵紫阳对自留地也是卖命地鼓吹扩大。陶铸胡说什么：“自留地是救命地”，他提出除了自留地，宅基地要留够以外，还可以多搞“自留山”、“自留沙荒”、“自留碱荒”，并且鼓吹：“小片零星荒地，也要分给社员私人垦种。”特别严重的，也是流毒最深，影响最广的是他提出的“借地”政策，把集体的耕地“借给”社员，自种自收，这是赤裸裸的分田到户。广东“借地”最普遍的是“借”冬种地，不少地方以减少集体种植的冬种地分给社员私种，有的甚至把集体已经种下的冬种作物也分给社员私人所有。

由于陶、赵拼命鼓吹扩大自留地，一些地区，特别是山区和一些丘陵较多的地区，私人开荒之风曾经盛行一时，据肇庆专区云浮县云城公社一九六一年调查，不少上中农和一些劳动力较多的社员，开荒地每户达几亩，多的平均每人达二、三分地。他们只顾发展私人生产，不顾集体出勤，对集体经济影响很大。一九六二年，陶铸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竟然得意洋洋地说什么：“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真是岂有此理！

陶铸、赵紫阳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刮单干风最感兴趣，鼓吹、推广得最为卖命。他们以加速恢复生产为名，行加速瓦解集体经济、破坏生产为实，大搞资本